



吉首大学“十一五”规划教材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

陈廷亮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吉首大学“十一五”规划教材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

陈廷亮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陈廷亮. -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 7-225-02719-0

I. 中… II. 陈… III. 史学史-概论-中国-古代 IV. K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5358 号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

陈廷亮 著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刷:湖南吉首大学彩印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20mm×960mm 1/16

印张:10

字数:180千

版次:2006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书号:ISBN 7-225-02719-0/K.192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序

如果说自从“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1〕}那么自从有了文字书写,我们就有了历史记载。要记载历史,一定要有人记载历史的人。从甲骨文开始就有“御史”、“卿史”之名,从此,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历代史家辈出,浩若繁星——司马迁、班固、陈寿、刘知几、杜佑、郑樵、司马光、章学诚……不胜枚举;史籍典册,汗牛充栋——仅一部二十四史,全世界绝无仅有,稗乘野史,更是不计其数。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2〕}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史学产生、成长、发展及变异的机制和一般规律,阐述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辉煌的史学的辉煌成就,无论是对于继承中国古代的丰富而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还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中国史学史是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也是历史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我校历史学专业自1986年创办以来,中国史学史一直就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开设。而中国史学史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仍然还是讲授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史学产生、成长、发展及变异的机制和一般规律,因此,学好中国古代史学史,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化史、历史文献学、史料学等相关分支学科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历史与文化学院的陈廷亮老师一直从事历史专业的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教学,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对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十分关注。他经常在与我交谈时感到如今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教材虽然很多,而且多半还都是出自史学名家之手,但多是大部头学术著作,对于历史学本科学生作为课外参考书较为合适,但作为教材使用却未必合适。因此他多次谈到欲编写一本适合我校历史学专业学生使用的如“概要”或“纲要”形式的简明教材,对此我很支持,并建议将其作为我校的精品教材建设的内容之一编写。

今年年初,陈廷亮老师将《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书稿送到我的办公桌上,说请我提出修改意见并要我为之写一篇序。由于我也是教历史的,我们是二十年的同行,因此我抽空一口气将这本十八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拜读完毕。读过之后感觉本书有三大特点:第一,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首先必须解决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问题。本书作者在对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讨论进行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述后,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标准和方法。作者将中国古代史学史分为中国史学的童年、中国封建史学的建立、发展和相对停滞四个时期的分期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第二,本书名为《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通观全书,作者按自己的分期法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分为五章叙述,文字简洁,全书仅用十几万字就将中国古代上下几千年史学产生、发展及变易的基本概况梳理得十分清楚,确属不易,真正体现了“概要”二字,因此无论是作为历史学专业的教材还是作为史学爱好者都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好书。正如梁启超说:“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1]”。第三,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史书可谓汗牛充栋,史学家也是浩若繁星,要将其一一叙述清楚,恐怕别说十几万字,就是几千万字也难叙述清楚,因此,在撰写中国古代史学史时就要有个取舍的问题。本书作者在取舍问题上做得十分成功,全书基本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史学名著和影响较大的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阐述清楚,同时又避免了繁杂,取舍得当。上述三点是我读过本书后的感受,也可以说是该书的特色所在。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具有相当的史学功力和十分勤奋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实践,形成了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和独特的研究视角。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作者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方法是否很科学也值得商榷;全书为了突出“概要”而对有些史籍和史家的介绍过于简单,对有些史家史学思想的评述也有主观之处等等。但瑕不掩玉,总的来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无论是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还是对于一般的史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也愿为之做本序。同时我也希望我校的广大教师多出这样的精品教材,为不断提高我校的本科教学共同努力。

杨俊

二〇〇六年初夏于吉首大学风雨湖畔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绪论

一、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史学史是研究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史学,研究这一时期史学本身发生、发展、变化和递嬗的过程。包括:

1. 历史观点、历史理论的发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史学理论有两个共同缺点:“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过程是这种关系的根源;”“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1〕}。我国“正史”中有“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2〕}的历史循环论,反映帝王活动中心论的编纂原则和书法:“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种族主义思想;以主观主义褒贬为特征的论赞、叙事的倾向性、曲笔阿时和取媚权贵的记载;由于政治原因的忌讳和对本朝的迴护等等。

但在史学发展过程中,进步史家亦表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史记》以财富占有情况和社会地位高低来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说明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的不同,表明作者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具有唯物主义观点。《左传》在全书范围内展开对春秋时期社会矛盾的记述,把旧社会秩序的破坏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表明作者对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描述,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在古代史学史上占支配地位。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观点在同它的对立斗争中存在和发展。各种不同历史观点和历史理论对史学发展起着不同作用。研究它们的对立斗争和不同作用,有助于掌握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2. 史科学的发展

我国具有丰富的史料学遗产。史料数量的逐渐积累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有一进步的过程,对史料鉴定、分析和利用也有一进步的过程。司马迁在史料搜集上既整理文献资料,又注意对史迹和个人采访;在史料处理上常以来历明确的材料反驳来历不明的材料,而对不能肯定的材料采取存疑的保留态度。吴缜《新唐书纠谬》专就史事记载错误进行校订;刘攽《西汉刊误》则就史书刊本伪误进行校订;裴松之《三国志注》对一部史书“正讹缪、辨当否”;而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则对多种史书校勘文字、纠正记事谬误、解释训诂名物。研究史料学这些丰

〔1〕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2〕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富遗产,考察史料学发展全过程,不仅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史料学所必需,而且有助于找到研究史学的门径,正确利用史料。

3. 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我国历史编纂学的遗产也非常丰富。从史书体裁门类看,《尚书》、《春秋》各为记言、记事一体,《诗经·生民》等篇可说是史诗,《庄子·天下》则为学术史雏形。《史记》实为综合先秦各种体裁而创立的纪传体。据《隋书·经籍志》、《四库提要》以及章学诚《史籍考》的分类,史书体裁达数十种之多。从一种体裁的发展看,如编年体从《春秋》、《左传》、荀悦《汉纪》、袁宏《后汉记》到《资治通鉴》,均各有发展;《通鉴》又发展出《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等,体裁上亦有发展,有的甚至发展出另一体裁。从历史编纂学以往经验和教训看,刘知几对各种体裁和设馆修史制度的论述,章学诚提出欧阳修撰修《新唐书》的教训,都是编纂学的遗产。研究并批判继承历史编纂学遗产,对编撰史书是有鉴益的。

4. 历史文学的发展

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史著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才得流传,因而必须研究历史文学。①许多大史家就是大文学家。《左传》、《史记》、《通鉴》对战争的记载,栩栩如生,有亲临沙场之感,为人称道。②著名史家往往在记述中有意识却又自然地表达其倾向性,不必外加评论,正所谓“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2〕}。这是历史文学中的优良传统。③史学理论著作中对历史文学理论和经验的论述,史学家对文学的观点,文学家对写历史的看法,也是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内容。

5. 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史学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由于史学能起借古鉴今的作用,掌握政权的阶级总要用史学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因而使史学的发展必然受一定政治、经济、思想、民族、史家个人诸历史条件的制约。

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以下现象:不同时期历史著作有其不同特点;每当历史发生显著变化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问世。因此史学史不仅着眼于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且还要研究它同社会发展的关系。

二、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任务

史学史的根本任务就是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史学史应着重研究:

〔1〕《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

1. 唯物主义观点同唯心主义的斗争

用社会物质条件还是用人们思想动机观察历史的斗争,贯穿着史学史。如司马迁已具有以财富占有情况和社会地位高低解释人们社会活动和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它不仅同正统唯心主义历史观之间斗争,而且同司马迁本人唯心主义观点有斗争。研究这一斗争,并把它同“五·四”运动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从而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并推动我国史学发展这一基本规律,是研究史学史的重要任务。

2. 历史进化论同历史循环论的斗争

历史发展是不断进步,还是治乱循环甚至一代不如一代退化的斗争,也贯穿着史学史。《春秋》的历史循环论和《左传》历史进化论明显对立。杜佑以“古今既异,形势亦殊”,“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穷”的历史进化论,竭力反对把三皇五帝时期美化为文明盛世的复古说教。研究史学史上进化论同循环论、倒退论的斗争,并把它同“五·四”运动以后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既区别开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从而阐明朴素辩证法观点和唯物辩证法在斗争中壮大并推动我国史学发展这一基本规律,也是研究史学史的任务。

3. 人定胜天说同天命论的斗争

历史发展决定于人事还是神意,也是史家历来存在的分歧。班固作《五行志》,宣扬用阴阳五行说解释历史的天命论。刘知几以文献学方法,指出班固的附会和矛盾,提出“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有言,则其理悖矣”。这就揭露了天命论的虚妄,剥去了封建皇权的神秘外衣,批判了君权神授观点。

4. 时势创造历史说同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

这是通史课中的老问题。《汉书·地理志》把封建诸侯和设立郡县反映历史变化的大事,解释成取决于英雄人物的主观愿望;杜佑、柳宗元、顾炎武等人则把它归之于时势的可与不可,反对把它说成是英雄人物的愿与不愿。

人定胜天说同天命论的斗争和时势创造历史说同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是政治上反对还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斗争在历史观上的反映。研究这些斗争,并把它同当时政治形势和“五·四”运动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而又区别开来,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从而阐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科学论断在斗争中壮大,并推动我国史学发展这一规律,也是研究史学史的任务。

上述基本规律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矛盾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的体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它们进行研究,揭示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促进当代史学的发展,是我们的任务。

5. 史学史上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

技术方面的发展既为基本规律所支配,又有自身的规律,研究这些规律,不仅要掌握技术性的细节,更要掌握其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并从而分析它们在史学发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史科学中为考史服务和烦琐考据的分歧,编纂学中按历史内容决定编写形式和恪守死板形式的斗争,历史文学中重视历史理论和追逐词藻的对立,在史学技术发展中始终存在着。研究这些规律有助于我们在总体上把握史学发展规律。

三、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方法

1. 精华与糟粕

古代史学成果的精华和糟粕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它一方面表现为一部史著精华与糟粕并存;另一方面表现为精华中有糟粕,糟粕中有精华。郑樵强调“会通之义”^{〔1〕},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史家的责任是贯通古今而极其变。但《通志》二十略和纪传部分颇不相称,前者体现通变观点之处较多,是全书精华,特别是《艺文略》;后者基本上因袭旧文而略有损益,闻不出多少通变气味,是全书糟粕最多部分。郑樵通变观点在实践上只能体现于学术史,而不能体现于政治史,因而还只是古今学术之变。司马光认为历史有着永恒秩序,“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2〕}。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3〕}而作《通鉴》的目的,是要证明永恒秩序之不可变。显然他写《通鉴》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不是史学遗产中的精华,但他对史料审订、史书编纂、历史文学,乃至集众人之功为一手的工作方法和以近二十年功力而成一书的精神,仍是史学遗产中的精华。

我们不但要把史学成果放到原来历史条件中去考察,还要放到现实需要中去考察,分析其中精华和糟粕。马克思主义者不止要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放到原来历史条件中去考察还只停留在说明阶段,更应从我国当代史学发展的需要出发,批判地继承和改造这些史学遗产。

2. 理论和资料

研究史学史需要占有丰富资料和较高理论水平,还需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我国史学史资料十分丰富,但旧史家或掉进史学浩瀚海洋,满足于史籍目录和内容介绍,或看到史学发展的波浪起伏,而抓不住史学发展的主流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

〔1〕 郑樵:《通志·总序》。

〔2〕 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

〔3〕 司马光:《进通鉴表》。

程来研究”^{〔1〕}，也应从这样的要求来研究史学史。

首先必须占有丰富的资料。陈垣教授曾提出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白寿彝教授针对具体情况提出“集中精力，占领堡垒”，即先攻读各时期的代表作，做到熟读深思，一则为研究其他史著打下基础，再则可由堡垒向四周发展。这样就可逐渐占有史学史资料。

同时我们还须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旧时学者不是没有研究过史学史，但却不曾用科学观点研究过史学史。解放后史界前辈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史学史取得了可贵成果，但从整个史学领域看史学史研究还显得薄弱。我们应以马列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发现史学矛盾运动的内在联系，逐渐揭示和把握其发展规律。

3. 借鉴和创新

借鉴包括研究古代资料和外国资料两方面。之所以要研究古代资料是因为：（1）古人研究成果对今人研究有直接影响；（2）古人研究方法许多还为今人所采用；（3）古人研究未解决的问题有待今人探索；（4）古今史学发展有其共同规律和不同时代特点，须贯通研究而极其变。之所以要研究外国资料是因为：注意外国研究可以取长补短；百余年来我国史学受外国不少影响，应探本溯源；中外史学发展有其共同基本规律和各种民族特点，须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外国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与中国史学史有密切关系。

借鉴古代和外国是为了提高史学史研究水平，促进当代史学发展，因而需要创造。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要求我们以创新精神来学习和研究。这就要我们用新的目的、观点和方法改造旧时的史学史，探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四、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问题

1. 建国以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

研究与撰述史学史，分期问题无法回避。建国以来，有关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甚丰，同时分歧也很大。

（1）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研究的两次高潮

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曾经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前期，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1961年，教育部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史学史被列入教材计划。以此为契机，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引起史学界关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汉、西安等地高校、史学会及研究机构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座谈会，就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

〔1〕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研究的目的、意义等问题进行研讨,其中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老一代史学家白寿彝、齐思和、刘节、贺昌群、陈千钧、方壮猷、王毓铨、尹达、孙毓棠、何兹全、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韩儒林、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余兆梓、李平心、田汝康、郭圣铭等都发表了对中国史学史基本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史学史的阶段性分期以及分期的标准,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当时的讨论有不少分歧,但多数人已注意到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要反映出史学史自身的发展过程,既不能与中国历史的分期相差太远,又不能将对历史的分期照搬到史学史的分期中,“大家同意基本上跟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但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般总要晚些”^[1]。白寿彝、齐思和、刘节、贺昌群、陈千钧等人还进行了具体划分,试图将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引入深入。可惜不久“文革”爆发,这次有关史学史的讨论被迫中断,分期问题也就被搁置起来,再也没人提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历史学科的再度兴盛,史学史研究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著作先后问世,六十年代没有解决的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再一次被提出讨论。陈其泰、仓修良、施丁、陶懋炳、瞿林东、张孟伦、陈光崇、许凌云、高国抗、邓子美、李宗邺、王树民、朱杰勤、吴怀祺、范沛滩、彭忠德、张家璠、吕美泉、宋衍申等史学史专家和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方法。他们或著文专论这一问题,或通过专著体现自己的观点,论证更加充实而深入。纵向上看,这一时期的分期讨论,有对六十年代讨论的继承,但更多的是提出新见。横向上看,这一时期的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多,所依据的分期标准更加不同,分歧也就更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六十年代有关史学史分期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上,付诸于史学史编撰实践的极少,只有白寿彝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刘节写出了《中国史学史稿》^[2],且都是讲义,系内部印行,传播不广。八十年代以后,理论探讨与著史实践并重,大量史学史著述出版,据朱仲玉 1997 年统计,就达十六种之多^[3]。近几年来又有这方面的著作出版,共计约二十余种。这些著述,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分期方法及标准,使分期问题愈显复杂与重要。

(2) 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的不同观点

① 四段分期法。贺昌群认为古代史学呈四个发展时期:司马迁以前为第一

[1] 《关于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

[2]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 年。

[3] 《中国史学史书录续篇》,《史学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期;司马迁至杜佑为第二期;郑樵至明末为第三期;清代历史考据学为第四期^[1]。陈千钧也将古代史学划分四个时期:奴隶社会时期(殷周至春秋末),史学起源,史书初出;封建社会前期(春秋末至隋),史学创立、奠基;封建社会中期(唐代至明中叶),史学发展、充实;封建社会后期(明至鸦片战争前),史学领域提出新见解,但找不到新出路^[2]。刘节也同意四分法,认为先秦是一期,从司马迁到刘知几是一期,从刘知几到《明史》是一期,乾嘉至清末是一期^[3]。仓修良的四段分期则是: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4]。高国抗与范沛淮的四分法很一致,都将中国古代史学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期^[5]。

②五段分期法。白寿彝将古代史学史分为五个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陈其泰赞同这一分期方法,并做了详尽说明^[6]。陶懋炳也采用五段分期法: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先秦),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期(秦汉),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期(魏晋至唐前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期(唐后期迄于宋元),中国古代史学的迟滞期(明和清前期)^[7]。

③六段分期法。许凌云则分为六个阶段,即先秦为萌芽期,两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初步发展期,隋唐为发展期,宋元明是上一期的继续,清代史学为相当发展期^[8]。邹贤俊也是六分法,即远古历史传说与殷周春秋时期史学的产生,战国秦汉时期史学的成长,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隋唐时期史学发展的新局面,五代宋元时期史学的继续发展,明清时期史学发展的相对停滞与新探索的出现^[9]。李炳泉的六分法则是:中国史学的产生(先秦),封建史学的形成(秦汉),封建史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封建史学的繁荣(隋唐五代),封建史学

[1] 贺昌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

[2] 《广东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

[3]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

[4] 仓修良:《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5] 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范沛淮:《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

[6] 白寿彝:《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浅议》,《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7]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许凌云:《读史入门》,北京出版社1984年。

[9] 邹贤俊:《中国古代史学史纲》,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

的顶峰(宋辽金元),封建史学的衰落(明清)^[1]。

④七段分期法。张孟伦分为七个时期,即先秦史学,秦汉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隋唐五代史学,宋代史学,元明史学,清代史学^[2]。宋衍申也是七分法,具体为:史学的产生(先秦),封建史学的奠基(秦汉),封建史学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封建史学的成熟(唐),封建史学的鼎盛(宋辽金元),封建史学的衰微(明),封建史学的终结(清前期)^[3]。

⑤九段分期法。瞿林东分为九个阶段:即史学的兴起(先秦),正史的创立(秦汉),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宋辽金),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元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前期),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清后期)^[4]。

(3)对分期标准及标志的探讨

分期标准的不同则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旨趣以及对史学史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对此,张越在1989年曾经进行过分析^[5]。如今,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有了很大进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见解,必须重新进行评述,以全面体现五十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①以史学之质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陈光崇、吕美泉便是以此把中国史学分为旧史学与新史学两大阶段的。在他们看来,用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等概念无法说明中国史学的质变,而旧史学、新史学却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旧史学、新史学无论是史学思想还是撰史方法,都有质的差别。这种分期方法注重史学的质变,但新、旧史学的内容的演进却无法揭示出来。他们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又将旧史学划分为若干阶段,以弥补过于粗疏的分期。

②单纯以史学思想为标准,以史书体裁为标志来分期。彭忠德认为史学史分期,宜着眼于史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而史学思想和史书体裁又分别是史学的灵魂和史学的书面表现形式,最具代表性。故而他把中国史学划分为神意思想、英雄思想、鉴戒思想、进化思想四个时期,并分别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为标志。这样的分期,似乎比较重视史学本身的状况,但缺陷也较明显,一个时期诸多史家的史学思想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诸多思想纠葛在一起的。这种

[1] 李炳泉:《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大出版社1997年。

[2] 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986年。

[3] 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

[4]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5] 张越:《中国史学史分期综述》,《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简单化的做法实际上很难揭示中国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

③以史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作为分期标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不同影响而在不同时期表现了不同的特征及发展趋势。抓住这些特征进行分期,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仓修良、瞿林东、王树民便是按此来划分的。仓修良划分史学史,除在第一段只标起源之外,其他三段均是以特征划分,即“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王树民的分期则是“王官之学时期(自上古到春秋末年)”,“史书体例成熟时期(战国至南北朝)”,“官修史书定局与史学新发展时期(唐宋元)”,“民间史学异军突起时期(明清)”,“史学蜕变时期(清末至民国)”。瞿林东在归纳各段特征时,更注重它们的前后连贯,将史学的发展概括为“史学的兴起——先秦史学”,“正史的创立——秦汉史学”,“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宋辽金元史学”,“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元代史学”,“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前期史学”,“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清代后期史学”。以这种标准划分史学史的分期,立足于史学本身,但又必然要考虑史学与社会互动,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对史学特点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故而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往往表现得非常丰富,每一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必然使史学特征变得丰富多样,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其特征,其结果必然大相径庭。仓、瞿、王的分期就很可能说明这一点。因此,这种分期标准多反映出研究者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及侧重,却很难完整全面地表现史学的发展过程。

④以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为分期标准。齐思和、李宗邺、刘节、邓子美、陶懋炳、高国抗、宋衍申等人均是以此划分史学发展阶段的。他们或把史学发展的过程描述为萌芽期、创建期、充实期、发展期、更新期,或描述为童年期、成长期、发展期、繁荣期、迟滞期,等等。尽管划分的阶段有多有少,但目的都是要反映出史学从发生到发展以至转变的全过程。研究者试图向人们勾画出清晰的史学发展的线索,有发展变化的眼光,其缺陷是忽视了史学发展的多样性,过于笼统,似乎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可这样分期,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⑤以社会形态的演变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陈千钧、尹达、周春元等人都是以这一标准来划分史学的阶段性发展的,尤以尹达主编之《中国史学发展史》表现最为明显。他们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说,把中国史学划分为奴隶社会的史学、封建社会的史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然后在此之下再划分小的段落,如把封建社会的史学划分为前、中、后三期等。以社会形态的分

期来解决史学史的分期,可以让我们看到某一社会形态之下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但这样的分期也存着一定的困难,首先是社会史本身的分期就存在许多理论及实际上的问题,悬而未决。其次是这样的分期仍不能很好地将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史学自身发展的真相难以表述清楚。

⑥以历史朝代的自然阶段作为主要依据,以著名史书、史家作为主要标志来考虑分期。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外是各个王朝的依次更替,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通史都是按朝代叙述的。这样的叙事习惯也大多被拿到史学史分期领域,同时又由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人们又在朝代之自然时段的更替中作了适当变通,以史书、史家为标志考虑史学史分期。贺昌群、张孟伦便是这样划分史学史的。贺昌群以司马迁、杜佑、郑樵为分段标志。张孟伦在依朝代叙述时,也标举孔子、《左传》、司马迁,等等。白寿彝也曾一度考虑过这种分期,并以司马迁、刘知几、杜佑,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作为分期标志。后来,感到这样划分有不妥之处,便开始考虑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标准。刘节也一度以朝代分,重点有三个: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但他感到这样分期片面性很大,便又考虑以司马迁、刘知几、《明史》以及乾嘉考据学为标志来划分。刘节在史学史分期问题上的反复思考,反映出恰当分期之不易。以历史朝代的自然阶段为据进行分期,好处是可以使人们在自己所熟悉的历史时段中去认识该时段史学发展的面貌。缺陷是往往是把成系统的史学史的内容切割得支离破碎,很难描述出史学在纵向上的依次递进的过程。

⑦以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标准。白寿彝、施丁、陈其泰、许凌云、范沛滩、张家璠等人均主张这样分期。尽管他们在分期时对具体阶段的划分尚有不同,但他们都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史学与社会历史的密切联系;一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他们认为,史学的发展与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密切相关,受到来自于社会各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等的制约和影响,使得它不得不带有每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印痕。同时,史学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有着合乎逻辑的承继与发展,并对社会历史有一定的反作用。在对史学史进行分期时,即要考虑它与社会历史相符合的一面,把史学史的分期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照应,同时又要看到它与社会历史不相符合的一面,要注意到史学史本身的发展规律。白寿彝就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将史学史的分期与自己的社会史分期相结合,把握每一个大时期内史学的发展规模及趋势,然后又根据史学自身在发展中所表现的不同特点,再相应地在一个大时期下划分出几个阶段。白寿彝注意从四个方面考虑分期:一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相互影响并出现不同特点;二是历史理论、历史观点及史学思想如何一步步出现新内容,或者曲折倒退;三是史书编撰、文献学如何不断推进;四是新的史学领域如何

被不断开拓。这样,把综合研究与贯穿古今结合起来,把社会因素与史学因素结合起来,考虑问题比较全面。

(4) 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迄今并无定论,在将来的若干年内,也不可能有一个大家都无异议的分期结果。这些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期问题讨论的过程,便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古代中国史学史撰述不断摆脱要籍解题式的形式,向完整成熟的史学史学科迈进。二十世纪上半叶,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注目点在“(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家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在此影响下产生了一批最初的史学史著作。时至今日,有更多的、高质量的史学史著作出现,而且研究的重点已由梁启超时代注目史官转向注目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修史制度、史家史学活动等,这些方面被当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行阐述,并通过分期问题的研究,试图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史学的演进变迁过程,原来彼此互不关联的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著述格局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探讨史学发展规律为主旨的史学史著述。尽管做得还不理想,但努力的方向是明确的。

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就是要总结我国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古代史学演进的过程,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规律,这已是史学史研究者的共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它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受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也要受哲学、政治等上层建筑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显示出极其复杂的景象。史学一旦形成,其发展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的规律,但这种发展规律不是孤立的,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他思潮相互影响的,人们无法割断它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我们从各家分期观点来看,尽管歧异很大,并且都有主要的分期标准,但无一例外也都注意到了对史学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特别是社会历史因素,这也说明纯粹从史学内部或单纯持一个标准是难以解决错综复杂的史学史的分期的,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史学史分期的研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资料的有无,而在于如何改进分析方法,从方法论上解决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的多样性,说明分期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意义期限的划分,它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史学以及史学史中一些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丰富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向人们展现了史学史的丰富内涵。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分期所赖以建立的史学史的研究基础还是薄弱的。首先,史学与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联系及相互作用还须深入探讨,并给予完整的理论上的说明,揭示这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是使史学史研究深入和成熟的条件。其次,要不断扩大史学史研究的领域,除对著名史家史著进行研究外,还要注重对二三流史家、史著的

研究,注重对民众史学意识的研究,注重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并进一步打破学科间的畛域,研究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文人等的史学见解,这些,都是构成我国史学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触摸到中国古代史学的根基,才能为正确分期打下坚实基础。第三,要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密切结合,把具体探讨某一种史学现象与宏观的理论探讨密切结合。将个别的微观研究向宏观的总体考察推进。尤其是对史学发展史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内容,要做贯通古今的思考。只有这样,才可能为分期找出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的线索。第四,要注意探讨史学史学科内部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等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行综合考察,在这种有机联系中探寻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因。第五,要加强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特点,为分期寻找一种参照。总之,分期所牵涉的史学问题和历史问题是多方面的,不是依据历史朝代或依据某些个别特征划分几个阶段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既要深入开拓史学史,又要注重方法论,只有当史学史研究十分深入时,分期问题才有望解决。^{〔1〕}

2. 本书采用的分期方法

史学史分期的目的,在于说明史学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及其特点:以助于揭示史学发展规律。史学史分期应充分考虑以下两个方面:(1)一定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史学史分期必然与社会史分期紧密联系;(2)史学发展为三个基本要素所构成,即各时期史家的历史观点;史家编撰技术的成就;史学范围扩大和史书种类增多,史学史分期应将它们加以综合考察。

具体分期如下:中国史学的童年(先秦);中国封建史学的建立(两汉);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一(魏晋至唐初);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二(唐中叶至明初);中国封建史学的相对停滞(明清)。

〔1〕 摘自:《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